

Historical Memory of East Asia (Special Topic Discussion)

Summary: **Buping** contends that politically the tense confrontation and struggle centering on historical issues have become a marked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and there is no sign of soothing or elimination; still, he believes that, academically, researches on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is region allow people to expect dialogues among these countries. This is because a relatively quiet zone for thoughts and conversation can thus be built so as to avoid any extrem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or any influence from extreme emotions. History study requires documentation and facts, providing an ele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dialogues among scholars of East Asia.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s, who are researchers in “the first line”, have long established a rather close exchange relationship, which renders joint research activity possible.

Murata Yujiro opines that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Russo-Japanese War, World Wars I and II in modern history had brought dramatic changes to both the internal political affairs of Japan and the political patterns of East Asia. The formation of Japan's wartime regime not only enhanced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democratization after wars, but also integrated Japan's militarism and external expansion into a whole scheme. However, the fourth “postwar” was an exception, in which democratization with neither military expansion nor colonialism was advocated under the belief of “peace and democracy”. Nonetheless, with the advent of a new wartime institution, namely the “cold war”, the issue of demilitarization had completely faded out postwar problems, particularly the problem of de-colonization. Consequently, responsibility concerning colonialism in democratization of the imperial age was forgotten. In this regard, we may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such remarks as “[Japan was] not beaten by China” and “Class A war criminals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losing the war (but no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war)”. And this could be considered the limitation of Japan's de-colonization after wars.

Bae Kyounghan has made the following points. Recently the escalating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in East Asia's histor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academic controversy; it is rather something related to state power, or the popular sentiment under the immense influence from state power; 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amplifies and deepens this kind of state power. In order to achiev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o establish the necessary historical memory, and to find out means for cultivating an ideal historical memory, all countries should study history as history of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They should confront and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history education, and should prevent and overcome “narrow nationalism”, a concept that would revive in the name of state policy.

Li Changli has noted that in Japan, certain ill-designed public opinion surveys and their misinterpretations led to misunderstanding among the media and public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which adversely affected the “national feelings” of the two peoples.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alization” are differently comprehended by the two peoples, which as a result hurt the national feeling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is a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re are ordinary peace-loving people in Japan who insist on reflecting Japan's past wars and on the many crimes committed during the invasion of China. Moreover, they are involved in friendly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Japan, they conserve such historic sites as places where Sun Yat-sen conducted hi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ll of the above are conducive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feeling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o strive for a peaceful friendship. Today, with the increasingly close economic ties and the accelerating interac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peoples should endeavor to achieve a “common history realization” based on their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y should lay the “national feelings” foundation of the China-Japan friendship through the “common history”, and thus together found a future of long-lasting peace.

Keywords: East Asia; common history; historical memory

[編者按]近年來，中、韓與日本之間因歷史認識問題屢生摩擦，成為影響東亞和平穩定的癥結。東亞三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有着長達千年的深遠歷史文化淵源，三國人民之間有着情同手足的友誼，但歷史記憶與歷史認識的差異卻成為損害三國人民感情和友好關係的障礙。對此，東亞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都深感憂慮。本刊特邀請分屬三國的四位研究東亞歷史並關注東亞關係問題的資深學者，從不同視角對東亞歷史問題作深度解讀，希望能給讀者一些新的啓示。

東亞歷史記憶（專題討論）

[提要]步平認為，雖然在政治層面圍繞歷史問題的對抗與鬥爭已成為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至今沒有緩解或消除的跡象，但在學術層面的跨國共同歷史研究也在提示人們，對東亞各國間的歷史對話應有期待。因為，學術研究可以建立相對冷靜的思考空間，保持相對安靜的對話環境，避免極端政治的干預和極端感情的影響。而歷史學研究重視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學術傳統，為在東亞學者間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提供了基本保障；處於學術研究層面第一線的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長期以來已建立了相對密切的交流關係，能夠創立共同研究的局面。村田雄二郎認為，在近現代歷史上，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先後經歷了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簡稱“二戰”）。這四個不同的“戰後”，不僅導致日本內政發生巨變，也引發東亞格局產生巨變。日本的戰時體制既形成促進戰後民主化的社會基礎，又與日本的軍國化及對外擴張融為一體推而進之，唯一例外的是第四個“戰後”，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理念下推行了沒有軍擴也沒有殖民主義的民主化，但日本對“戰後”特別是去殖民地化問題的處理，隨着“冷戰”這一新的戰時體制的出現，完全被非軍事化問題沖淡了，使得帝國時代民主化所內含的殖民地主義責任被忘卻；這既可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沒有敗給中國”、“甲級戰犯的責任是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等歷史認識，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裴京漢認為，近來持續升級的東亞歷史矛盾，與其說是學術領域的爭議，不如說是國家權力或者國家權力巨大影響力背後的普通大眾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義的理念，又對這種國家權力給予凸顯與深化。為了東亞三國實現和平共榮的目標，構建所需的歷史記憶，摸索創建理想歷史記憶的途徑，各國均須從東亞歷史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正視和解決歷史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防止和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借國家政策名義復活，增強“廣泛的民族主義”覺悟。李長莉認為，日本一些設計得並不準確的輿論調查以及有所偏失的解讀，對兩國媒體和民衆造成誤導，對兩國“國民感情”造成了損害。雖然由於歷史原因，中日兩國國民“歷史記憶”和“歷史認識”存在差異，對兩國國民感情和兩國關係形成阻礙，但在兩國民間仍然存在着深厚的友好感情基礎，特別是日本民間一直有和平人士堅持進行反省戰爭、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罪行、致力於中日友好的活動，在日本多地也留存着孫中山革命活動等近代中日友好的遺跡，可以作為兩國民衆共有的“歷史記憶”。這些都有利於增進兩國“國民感情”，共謀和平友好。當今兩國經濟聯繫愈益緊密、民衆相互來往增多及交流日益擴大，兩國民衆需從“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做起，向“共同歷史認識”趨近，通過“歷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國民感情”基礎，共同開創永久和平的未來。

[關鍵詞]東亞 歷史共有 歷史記憶

東亞歷史問題對話之前景

步 平



歷史問題是長期阻礙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戰後七十年來，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間圍繞日本發動的侵略中國戰爭的歷史，以及日本對朝鮮實施殖民統治的歷史，在認識上始終存在爭論。因而在國際社會看來，圍繞歷史問題的激烈對抗與鬥爭已成為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至今仍沒有緩解或消除的跡象。

不過，從2002年起，中、日、韓三國的學者就開始了共同編寫東亞近現代史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了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而韓日與中日間由政府主導的歷史共同研究也分別於2002年和2006年啓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報告書更於2014年出版。由於筆者參與了上述學者間和政府間兩個不同層面的共同研究，因而認為，近十多年來的跨國共同歷史研究在預示或提示人們，對東亞各國間的歷史對話應有期待。

一、中日韓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研究與對話的實踐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學者間關於歷史問題的學術層面的對話日漸活躍起來。三國的歷史學界不同程度地關注拓寬本國歷史學視角的問題，日本一些大學組織了有日本、美國、中國（包括臺灣）、韓國學者參與的關於“東亞的相互認識與誤解”的研究，就東亞歷史認識的問題點進行討論，並提出了研究報告；^①中日韓三國學者還圍繞日本社會出現的編寫“新歷史教科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動向進行了學術交流，以東亞各國民衆間歷史認識的相互理解為目標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東亞的共生與歷史教科書的問題，^②並分別提出了以共同研究為基礎的成果。^③

進入21世紀後，東亞地區歷史學者的對話主要體現在共同研究與編寫歷史書籍和教材的努力上，並且有了新的成果。2006年，日本學者與在日的中國學者共同討論以歷史問題為背景的中日兩國的社會變動，出版了研究性專著《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④跨越國境的共同歷史研究與編寫教材的努力雖然表現形式不同，深入程度不一，但通過歷史對話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的目標是共同的，其目的是一是力圖擺脫各國在世界歷史的敘述中受西方中心論影響較大的問題，提高關於亞洲自身敘述的比重；二是努力將本國歷史與東亞歷史的大背景結合起來，特別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國歷史框架的東亞史的敘述”。

在東亞歷史學者的對話中，中、日、韓三國學者與民間團體一直持續至今的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努力，是在歷史認識上實現“超越”的積極嘗試。

三國學者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動議是2002年提出的，起因是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

① [日]山室信一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上越教育大學東亞研究會：《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新しい歴史表像をめざして——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との対話》（大阪：清文堂，2002）；[日]二谷貞夫 編：《21世紀の歴史認識と國際理解——韓國・中國・日本からの提言》（東京：明石書店，2004）。

②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 編：《歴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話——日韓合同歴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東京：大月書店，2004）。

③ [日]君島和彥：《教科書の思想——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東京：すずさわ書店，1996）；[韓]鄭在貞：《韓國と日本歴史教育の思想》（東京：すずさわ書店，1998）。

④ 中文、日文版的《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分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06年出版。

了扶桑社的《新歷史教科書》。這本由具有歷史修正主義傾向的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寫會”編寫的教科書表明了十分狹隘的日本民族主義的主張，對戰爭歷史的敘述有回到“皇國史觀”的危險。中、日、韓學者在對扶桑社歷史教科書進行分析批判的時候意識到，如果要引導東亞三國的青少年擺脫狹隘民族主義的藩籬，建立面向未來的歷史認識，首先學者們就必須突破以本國為中心進行敘述的傳統歷史教科書的局限，通過共同編寫歷史教材，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歷史事實的共有，以促進民衆間的相互瞭解。所以，從2002年起，三國學者將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輔助教材《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作為第一階段的目標，開展不同國家間歷史學者的對話。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從提出編寫的動議到完成，用了三年多的時間，主要記述西方列強入侵東亞引起的東亞社會的變化，日本崛起後對東亞傳統國際秩序的破壞，即對中國的戰爭和對朝鮮的殖民統治，日本的戰後處理與戰後遺留問題（靖國神社、民間賠償等）。全書結構確定後，由三國學者分工執筆，提出初稿後逐章逐節地討論。編寫過程開始後，發現其複雜程度大大超出預想：正式討論的初稿就有六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翻譯成三種文字進行對照，每個觀點甚至每句話都要反復推敲，以致正式會議在三個國家召開過十一次，還不包括會議之外幾乎每天都通過電子郵件進行的交流、交涉、討論。

2005年，《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在中、日、韓同時出版^①，均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首先，書的發行量大大超過預計，也大大超過此類書的平均發行量。在中國達十三萬冊，在日本超過六萬冊，在韓國也達到五萬冊。其次，三國都有部分學校用來作為歷史教材的補充，在學生中也有很好的評價。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出版後也收到一些批評意見。主要的意見是：本國學者撰寫本國歷史的痕跡仍然比較明顯，在建立跨越國境歷史認識方面仍有缺陷；敘述內容偏重於戰爭歷史，缺少對社會變化的全面的觀察與分析。

針對這些批評，三國學者認為，應將修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作為第二階段歷史問題對話的目標，在對東亞歷史問題進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基礎上，力圖在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尋求東亞的視角。從2006年起，三國學者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歷史問題對話，即共同編寫新的東亞史。新的東亞史由上下兩卷構成，上卷主要從國際關係變動的角度對東亞近現代史進行敘述，下卷則講述三國社會變遷與民衆的生活與交流。

之所以分上下卷講述東亞的近現代史，是基於下述原因：

第一，東亞國際政治近代以來的演變固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到今天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但國際關係的變動並不能構成東亞近現代史的全部。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看，近代東亞地區人的交流與移動是這一地區最有活力、最積極的因素，也是歷史學必須關注的問題。

第二，與國際政治學側重於從國家這一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為主體層面出發思考問題，注重研究國家基於利益的衝突與合作的研究方法相比，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基本點是人，更關注人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提出了人類“共同生存”的問題。

第三，如果說不同國家的學者在國際政治層面的研究中可能找到比較多分歧點的話，那麼，在社會文化層面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共性和一致的地方。而由此可以相對比較容易地獲得基本的歷史認識的共識。

為使獲得歷史共識成為現實，必須突破本國學者撰寫本國歷史的局限。在第二階段的編寫中，要求執筆者務必體現東亞的視角，不僅介紹本國的情況，而且要介紹他國的情況，特別要突破“本國視角”觀察與分析歷史現象。所以，第二階段的歷史問題對話比第一階段更深入，也更困難，編

^①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未來を開く歴史》（東京：明石書店，2005）；《未來を開く歴史》（首爾：한겨레新聞社，2005）。三種文字在內容上完全一致。

寫時間大大超過了預計的三年，到2012年出版（中文書名為《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時^①，時間多花費了一倍。但即使是這樣，仍有一些遺留問題。特別是下卷第八章“戰爭與民衆”，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所以中文本和日文本在韓國學者執筆的這一章後面附上了各自的不同見解。不過，這一現象恰好證明：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的建立是需要經歷曲折過程的。目前，第二階段的這一成果正在被翻譯成英文，計劃在2015年出版。而三國學者正在思考進入第三階段的歷史問題的對話。

東亞地區關於歷史問題的對話要求超越本國歷史，超越國民國家的歷史記憶，是一個很有挑戰意義的問題，需要歷史學家統合相互不同的歷史記憶，探索其中的關聯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這種關聯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認真研究，纔能實現歷史認識的共有。通過歷史問題的對話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不僅對於穩固東亞各國間的關係有積極的意義，不僅是基於各自國家的外交戰略的互惠要求，更重要的是實現東亞，乃至亞洲及世界範圍內的包含社會、文化層次相互理解的基本條件。雖然這一過程不能期待一朝一夕完成，但必須扎扎实實地努力。

二、中日政府層面共同歷史研究的成果

在中、日、韓學者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同時，東亞三國政府間也在嘗試進行歷史共同研究的努力。從2002年起，日本與韓國政府間組成了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2006年起，中日兩國政府間也組成了各有十名學者參加的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經過三年的努力，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報告在2010年1月發表，2014年正式出版。^②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採取“同一題目，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的方式，對共同擬定的16個題目各自提出研究論文，即共有32篇，分為古代與中世紀史卷和近現代史卷兩部分組成。在論文完成過程中，經過了反復討論與修改。所以，報告儘管是“兩論並記”的方式，最終體現的是撰寫者本人的認識，但在研究過程中的經過討論形成的共識，可以認同的對方的主張，在各自的論文中均得到了體現。^③

政府主導的歷史共同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其政治意義大於學術意義，因此也比學者間的共同研究更複雜、更困難。儘管中日兩國都有人對共同研究的結果提出過批評意見，但總的來看，學術界和輿論界對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是冷靜的，說明大多數人對學者進行的研究採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態度。可以說，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為推動新時期中日關係的發展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一，此次共同歷史研究推動了兩國學者間的相互理解，開創了不同國家間的歷史學者進行深入交流的新局面。

古代史組的兩國學者始終本着謙虛的態度，就歷史認識進行坦率與公正的對話。兩國學者都認為，不能把古代與中世紀的中日兩國關係簡單地定位於和平相處，而把近代的中日關係簡單地定位於戰爭與衝突。但也並不排除雙方學者對某一問題具有不同的關注點和處理方法。對於中日文化的相互影響與發展，日方學者重視中國文化的傳播與影響，而中方學者對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與創造性給予充分的評價，從而能夠共同關注兩國文化相互影響與相互激勵的歷史進程。

近代史組的雙方學者對中日戰爭的性質進行了充分討論，在各自的論文中都明確指出：自1931年到1945年的中日戰爭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闡述了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傷害與損失，表達了譴責侵略戰爭和維護和平的願望。中方委員會認為：對侵略戰爭性質的認定是中日之間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必須首先形成共識，然後纔能開始學術研究。日方學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確承認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傷害，認為戰爭中因日軍

① 《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新しい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東京：日本評論社，2013）；韓文書名與日文相同，由Humanist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②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日文本由日本勉誠出版社2014年出版。

③ 近代史卷本來由三部九章構成，由於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涉及的歷史距離現在比較近，而相關資料的開放尚不充分，並且也包含了與當前中日關係直接相關的政治問題。為使共同研究真正促進中日兩國在歷史認識方面的相互瞭解與理解，擬將這一階段的問題納入第二階段繼續研究，此次發表的報告中沒有包括這一部分論文。

的種種非法行爲造成了大量中國平民的犧牲，造成了深刻的戰爭傷痕，是構築戰後新的中日關係的障礙。他們的論文還認為：近年關於遺棄化學武器、強制徵用勞工、對婦女的暴行等問題的訴訟，都是戰爭帶給中國人民深刻傷痕的表現。

在研究中，雙方學者有共同的一點體會，那就是由於中日兩國文化背景、歷史經歷和國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對歷史的敘述和認識也存在差異。對於由於這一原因產生的差異，需要通過加強兩國學術界及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而保持安靜與冷靜的學術氣氛，可使雙方在歷史認識的交流中達到相互理解，獲得更多的趨同，從而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豐富歷史內涵得以實現。

第二，共同歷史研究為民衆間跨越國境歷史認識的建立提供了樣板。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雙方對有關具體歷史過程的描述、認識與判斷，還存在相當多的分歧。不過，這些基本屬於學術研究層面的問題，需要在扎扎实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上提出結論。如果沒有分歧和差異，學術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實證研究不充分，或者實證研究的基礎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存在不同認識與判斷是可以理解的。具體來說，在對侵略戰爭性質有基本共識的前提下，對具體過程的認識與判斷，如戰爭原因的分析，侵略戰爭發生的必然性與具體事件的偶然性等問題，雙方觀察歷史問題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異。在搞清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就觀察問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進行交流。在這樣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存在問題和差異是很正常的。

但是，包括部分媒體在內，民衆關於學術研究的這種尊重客觀事實和重視實證研究的方式，在理解上還需要時間；如果媒體能夠從積極的角度對共同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紹，肯定能夠促進兩國民衆間的相互理解，促進消除不必要的誤解，縮小認識的差距，對穩定中日關係的發展起積極作用。

第三，共同歷史研究為從政治層面定位影響中日關係的歷史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根據。

中日歷史認識中的分歧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例如，對侵略戰爭性質的認定問題，必須形成基本的共識，否則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礎。二是對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描述，由於各自掌握的資料不同而有差異。但對於這樣的分歧，通過資料的交換與交流，可以本着一切皆以史料為依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原則，逐漸接近。三是對歷史進程或歷史事件的宏觀的分析，受各種因素影響，雙方的研究方法，甚至歷史觀都有很大差異。對這樣的分歧，以交換意見、促進相互理解為目標，不強求取得共識。比如，中國民衆普遍認為，1931—1945年間，一直是以日本軍國主義為對手進行的反侵略的抗日戰爭；但在日本方面，由於隨着戰爭的進行，對手有中國、美國與蘇聯，因此對作戰對象不同的各個時期的戰爭性質，學術界和民間有種種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是日本對外的“十五年戰爭”，也有的認為應將對華、對美、對蘇的戰爭性質區分。根據近年來多次輿論調查的結果，大多數人（一般認為在70%左右）承認對中國戰爭的侵略性質，但是對與美國、蘇聯戰爭性質的認識則相對複雜。

中方委員會從一開始就認為，必須在共同研究中明確日本在近代向中國發動戰爭的侵略性質，同時又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否認侵略戰爭性質是導致中日歷史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日本學者理解，正是由於中國民衆有痛苦的戰爭受害經歷，所以非常關注對戰爭性質的判斷，故明確承認了侵略戰爭的性質；同時也提出，雙方因戰爭期間歷史體驗不同而產生有差異歷史認識的現實問題。

三、共同研究和編寫東亞歷史需要釐清的兩個概念

在東亞地區圍繞歷史問題的爭議相當激烈的背景下，為什麼還要對歷史問題共同研究和共同編寫東亞歷史呢？這裏需要釐清兩個重要的概念。

其一，在共同研究中，中國學者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外國，特別是日本學者？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應瞭解戰後日本社會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鬥爭與爭論。

戰後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他們所說的“懺悔”，其實是要民衆

反思戰爭沒有取得勝利的責任，是在掩蓋日本的戰爭責任。但通過戰後審判，日本人第一次瞭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軍人在亞洲戰場上的暴虐行爲後，開始接受了以日本共產黨爲中心的左翼勢力提出的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國家的及以天皇爲首的指導者戰爭責任的主張。進而，瞭解了歷史真實的知識分子開始悔恨自己盲目或迫於壓力支持戰爭的行爲。當然，此時大多數日本民衆仍從受軍部欺騙宣傳的戰爭受害者的立場思考戰爭責任問題，雖然產生了強烈的厭戰、反戰情緒，但對那一場戰爭尚未產生贖罪意識。^①

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伴隨大規模反對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和平運動的興起，一些經歷過戰爭而有覺悟的日本人開始從單純記憶自己戰爭受害的意識中跳出來，克服一國和平主義的狹隘的視野，與亞洲鄰國的民衆一起思考戰爭責任與和平問題。^②這是日本民衆戰爭責任認識的重大的飛躍。隨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兩國往來的活躍，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的暴行爲更多的日本人所瞭解，“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的概念開始在日本社會流行。如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所說：“我作爲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決日本的戰後責任問題，看作是一個大好時機。這是因爲，如能做到認真對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個世紀前就應該承擔的責任承擔起來的話，就可以重新恢復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失去的鄰邦的信賴關係。纔能以此爲出發點，使日本同永久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人們成爲睦鄰，在東亞和平共處。正是這些想法，一直驅使着我要在戰爭責任、戰後責任問題上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遺憾的是，縱觀日本社會這十年來的動向，情況並沒有按照我的願望發展。”^③他的歷史認識代表了一代日本知識分子，這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能夠開展的前提。

其二，東亞歷史問題表現在政治、感情、學術三個不同層面，而不僅僅是政治一個層面。

政治層面關於東亞歷史問題的對話，要求日本政府對侵略中國的戰爭性質加以明確的政治判斷，即向遭受其侵略的中國表示反省和道歉。其實，日本在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已經在政治層面觸及了戰爭責任問題，表示了“深刻的反省”；但由於部分日本政治家經常發出否認侵略戰爭責任、堅持戰爭時期歷史認識的“妄言”，在國際社會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亞洲各國對日本的所謂‘誤解’總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於日本的右翼政治家們的言行。”^④反省與否認侵略戰爭責任的兩種聲音同時經媒體暴露在國際社會，產生了“零和博弈”的效應，讓人們感到戰後的日本社會似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使東亞各國在政治層面的對話呈現複雜的狀況。

不過，政治層面的問題固然相當重要，但並不是東亞歷史問題的唯一層面，值得關注的還有反映在民衆感情層面的和學術研究層面的歷史問題。在後兩個層面上進行對話，是解決東亞歷史問題的重要環節。

民衆感情層面的對話主要針對東亞民衆關於戰爭歷史的集體記憶，因爲對於東亞各國民衆來說，關於戰爭歷史的集體記憶最深刻的側面都是戰爭中的被害。例如，在中國，關於戰爭的記憶有“南京大屠殺”、“731細菌部隊”、“三光作戰”等，在韓國有“從軍慰安婦”、“殖民地支配”和“創世改名”等；而在日本，主要的戰爭記憶有“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東京大空襲”、“沖繩作戰”等。雙方的民衆關於戰爭的歷史記憶毫無疑問都是事實，但是並不對稱。同時具有戰爭被害與戰爭加害雙重角色的日本國民如果被局限在“本國內部的狹隘的視野”中^⑤，就會導致“加害意識的缺失”。日本人在對加害責任缺乏反省的情況下強調自己的“被害體驗”，不可能得到被害國中國與韓國民衆的廣泛理解^⑥，也不可能瞭解同一歷史過程對於戰爭被害國國民

① [日]梅靖三：《戰爭是罪惡》（東京：昭和出版，1994），第192頁。

② [日]石田雄：“反戰和平思想與運動中的歷史認識”，《“歷史認識”論爭》（東京：作品社，2002），第79頁。

③ [日]高橋哲哉：“中譯本序言”，《戰後責任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第1頁。

④ [日]若宮啓文：《和解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吳寄南譯，第63頁。

⑤ [日]大沼保昭：《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後責任》（東京：東信堂，2007），第144頁。

⑥ [日]吉田裕：《現代歷史學と戰爭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第183—188頁。

的體驗。所以，東亞各國民衆的感情層面的對話，主要應當是深入交往與加強相互理解。

學術層面的對話主要解決東亞各國歷史學研究中因資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異及歷史體驗的不同而產生的認識差異問題。例如，中國歷史學界在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研究的時候，比較關注各個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力圖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現象背後的東西，如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發展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再到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反映出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而日本的歷史學者即使承認戰爭的侵略性，更注重研究的則是諸多事件發生時的具體的主客觀原因，如“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軍部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態度；“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偶然因素等。

從具體事件發生的偶然性與國家關係走向的必然性角度，從個性與共性的歷史哲學層面對歷史問題進行研究是歷史學追求的理想模式。不同國家的學者雖然各自強調的側面不同，但祇要注重歷史研究的科學性，研究方法的差異是可以通過學術交流和深入交換意見逐漸接近的。在這一方面，日本學者對於側重研究一個一個具體的事實而忽視描述發展趨勢的問題有所意識，中國學者也開始注意論證日本侵華的計劃性與一貫性需要對證據資料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

上述東亞歷史問題的三個層面並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三個層面的問題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不過，對於解決歷史問題來說，從學術研究層面入手進行對話是最現實和最可以操作的，學術層面的對話可以成為其他兩個層面對話的前提和基礎。因為，學術研究可以建立相對冷靜的思考空間，保持相對安靜的對話環境，避免極端政治的干預和極端感情的影響。而歷史學研究重視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學術傳統，為在東亞學者間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提供了基本保障。處於學術研究層面第一線的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長期以來已經建立了相對密切的交流關係，能夠創立共同研究的局面。

按照東亞各國間開展共同歷史研究的主張，今後政治家關於中日歷史問題的表態，應當根據歷史學家的結論。那麼，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理所當然地應成為今後日本政治家政治表態應遵循的原則。國際社會在密切關注安倍首相即將發表的“戰後七十周年談話”是接受還是拒絕這一學術研究的成果。

[作者簡介]步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員，兼任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橫濱市立大學客座教授、新潟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日關係史、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靖國神社與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右翼問題研究》、《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等。

近現代東亞的四個“戰後”

村田雄二郎



在近現代歷史上，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先後經歷了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簡稱“二戰”）。這四個不同的“戰後”，不僅導致日本內政發生巨變，也引發東亞格局產生巨變。本文試圖通過分析這四個不同的“戰後”性質，來對這種巨變作初步的理論探討。

一、甲午戰爭的戰後

甲午戰爭的爆發，在日本一方看來，是日中之間圍繞朝鮮王朝的國際地位而引發的武力衝突事件，因此戰後簽署的《馬關條

約》第一條規定：“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以清朝為宗主國的東亞朝貢冊封體制宣告終結，為以獨立主權國家為單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創造條件。

但是，它並未給該地區帶來對等的國家關係。通過《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了從清朝割讓出來的與該戰爭無直接關聯的臺灣及澎湖列島，開始了向帝國周邊地區的殖民統治。^①而實現了“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的朝鮮，又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戰爭後，更是被日本以“合併”之名而亡國。可以說，甲午戰爭同時也是日本帝國化和殖民統治的開端。

正因如此，甲午戰爭是重新繪製近代東亞政治地圖的巨大轉捩點。在當時日本人心目中，這場戰爭的結果動搖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確立了自身作為“文明國家”的霸權；較為典型者如福澤諭吉（1835—1901）認為，甲午戰爭“是努力文明開化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一方之間的戰爭”^②。而在戰敗國朝鮮和中國，則因甲午戰爭引發了正負兩面的複雜反應。其中一點就是，朝鮮和中國臺灣的民衆為抵抗日本軍事統治展開了長期抗爭，令日本統治者苦不堪言。

與此同時，日本的勝利也成為朝鮮和中國體制改革的契機。朝鮮為向內外宣示自身獨立，於1897年10月成立大韓帝國，開始實行名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中國則因戰敗，變法的呼聲高漲，1898年的“戊戌變法”令改革熱潮達到頂峰。以全面改變舊體制為目標，強化君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雖遭到守舊派和日本的干涉而短時間內夭折，卻成了近代國家形成的“原點”。值得關注的是，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東亞國際秩序中，出現了類似的君主立憲制的帝國鼎立狀況（大日本帝國、大韓帝國、大清帝國）。1899年9月，大韓帝國與大清帝國簽訂了平等的通商條約，並互派常駐使節，形成了近代條約關係。

在此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日本的民主化是與軍國化同時進行的。作為勝方的日本獲取了清國三億日元的戰爭賠款，加上清國贖回遼東半島的三千萬日元，合計獲取了三億三千萬，一舉改善了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該數字也遠超戰爭所花費的數額，日本由此獲得了戰前國家收入（八千萬日元）近四倍的賠款。^③不用說，其中的大部分（兩億八千萬）都用在擴充軍備上了。陸軍計劃將六個師團擴充到十二個，海軍也開始着手建造基於“6—6艦隊”方案（6艘鐵甲艦，6艘一等巡洋艦）的大型船舶，財源均來自清國的賠款。“戰後”的日本開始以俄國為假想敵，迅速走向軍事大國之路。

同時，日本政府（藩閥）與政黨（民黨）的關係也因戰爭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以前，政府與佔議會多數的在野黨為軍費預算爭論不休，互相對立；經過戰爭中的政治休戰後，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得到增強。結果就是，自由黨等在野黨的參政之路得以開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1841—1909）為黨首的“立憲政友會”。但這並非意味着政黨政治的實現，政府和政黨的關係依然處於微妙的對立狀態。從藩閥的政黨化和政黨的藩閥化這點來說，甲午戰爭使得日本議會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④這種民主化的背後，是日本國民受勝利刺激後，對政府對外擴張政策的支持。而獲得了擴軍所需的巨額賠款後，藩閥—政黨聯合政權又開始積極地推動軍國化。

二、日俄戰爭的“戰後”

日俄戰爭是日俄為爭奪在中國東北的霸權而起的戰爭。作為主戰場的中國代表，雖提出要求但竟未被邀請參加朴茨茅斯和平會議。決定“戰後”秩序的，是日本、俄國以及從中斡旋的美

^① 近年研究中一個有力的觀點是，批准並交換《馬關條約》文書（1895年5月8日）後，日本派去佔領臺灣的軍隊，與臺灣民主國軍、抗日義勇軍之間發生的“日臺戰爭”也算作甲午戰爭的一部分〔[日]大谷正：《日清戰爭》（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第242—244頁〕。

^② [日]福澤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時事新報》1894-07-29。

^③ [日]阪野潤治：《日本近代史》（東京：築摩書房，2013），第251頁。

^④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東京：岩波書店，1997），第36頁。

國。尤其是戰勝國日本的自我存在感，自此戰役後飛速高漲。此後，日本政府和軍隊在民衆的帝國意識的鼓舞下，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朝鮮和“滿蒙”的獨佔地位。

“戰後”出現的新潮流，可概括為內政與外交的一體化。這可以說主要是輿論的抬頭和強硬化。具體而言，日俄戰爭後的日本，通過議會和媒體發佈的輿論（公論），獲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內政、外交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時甚至還起到先導性作用。沒有民意支撐的政權，其運行也將變得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重視民意是民主化進展的體現。另外，從其確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後盾這樣的體制來說，重視民意也可以說是“國民外交”的萌芽。

對日本而言，日俄戰爭無論從財政還是兵力來看，均非甲午戰爭所能比擬，是負擔沉重的角力戰和消磨戰，最後都要依賴納稅人即農村地主負擔，徵兵對象也是農民。而且，募集軍費需要不斷的增稅，使得擁有選舉權人數在日俄戰爭期間猛增了四倍。與此相應，隨着社會對普選要求的呼聲漸高，1911年衆議院通過了普通選舉法（貴族院否決）。由此可見，國民的政治話語權逐漸增大。^①這也可以視做由戰爭推動民主化的一個案例。

而且，民主化也是與帝國對外膨脹的欲望表裏一體的。“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浮田和民）這個當時膾炙人口的大正民主綱領，是日俄戰爭後不久，民間團體發出的對外強硬論，它反映了此時期社會意識的巨大變化。的確，“戰後”開始抬頭的民衆的對外強硬論，將不被現有政黨接受的龐大城市下層民衆作為“國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開始朝着確立舉國一致的立憲制邁進。^②而且，“日比谷燒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憤，也與上述對外強硬派所持的國民主義的政治要求聯結起來——圍繞和談問題的強硬言論，不僅停留在批評未能獲得賠款的“軟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國擴張的目標下，與貧困和失業中掙扎的國民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產生更深層次的共鳴。^③

民衆因戰爭勝利開始追求更進一步的對外擴張，並支持發動下一次戰爭。從這層意義而言，日俄戰爭可謂是帝國日本膨脹主義的“原型”（prototype）。不僅如此，“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論調不但被輿論所認可，更廣為當時政治高層人物所贊同。就連桂太郎（1848—1913）這樣的藩閥政治家，在“戰後”也決定成立新黨（立憲統一黨），主張實現更多的國民參政。此事說明，在日俄戰爭後，上述“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理念成為了官民共有的、強力的國民目標。^④此期間，雖有部分有識之士批評領土擴張和殖民統治，並主張“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和三浦鐵太郎），但大多數日本人還是積極支持帝國日本的膨脹，甚至有時發出比政府還強硬的言論。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

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是以歐洲為主戰場的。東亞方面除青島戰役外^⑤，並無直接交火。儘管如此，日本和中國均加入協約國參戰，並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和談，在許多“戰後”問題處理上成為相關主體。

決定東亞“戰後”國際秩序的，是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會上主要討論裁軍和中國問題，會後締結的《九國公約》中也提出要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並確認了中國市場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這雖然未否定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卻也牽制了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日漸加速的對華攻勢。將日本獲得的山東半島權益歸還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協調下支援中國發展，

^{①②}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43、250頁。

^③ [日]櫻井良樹：“日露戰爭後の日本——‘大國民’意識と戦後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2卷：日露戰爭と韓國併合（19世紀末—190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第293頁。

^④ [日]千葉功：《桂太郎——外に帝國主義、内に立憲主義》（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第233頁。

^⑤ 1914年1月—11月，日軍、英軍對德國租借地中國膠州灣的攻略戰。

是“戰後”秩序的基調。此外，為遏制海軍擴張，各國還締結了主力艦持有比例的《美英法意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從而暫時遏止了日俄戰爭後日本追求的軍擴路線。在此會議上，日英於1902年締結的同盟關係也遭廢棄。由此，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迎來了被稱為“華盛頓體系”的安定時期。日本外交亦順應該體制，進入了以國際合作、重視經濟、不干涉中國為核心的“幣原外交”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體制變革，對日本、中國、朝鮮都帶來巨大影響。這不僅體現在戰時體制的繼續和延長，也包括觸動了席捲世界的新理念和意識形態。具體而言，有威爾遜（T. W. Wilson, 1856—1924）的《和平條款十四條》和共產國際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綱領》，包括和平主義、人道主義、世界主義、民族自決、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成為引導改造國家和解放社會的新理念，席捲“戰後”東亞。無論是日本的大正民主，還是中國的五四運動，抑或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以及殖民地臺灣的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等，雖然運動的意義不盡相同，但都是受這樣的戰後理念驅動而產生的民衆運動。

日本“戰前”和“戰後”的最大變化，是甲午戰爭以來民主化與軍事化相互促進的關係在“一戰”中中斷，開始了“沒有軍事化的民主化”^①。華盛頓體系給日本在中國大陸擴大權益套上了緊箍。另外，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不斷發生以民族自決和民族解放為目的的大規模抗議運動，令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武斷政治”面臨巨大挑戰。統治者在殖民地言及“自治”和“文治（文化政治）”等詞，也是“戰後”纔有的事情。行使武力和佔領殖民地，無論在道義還是法律上都不再有正當性。此種世界形勢下，殖民地臺灣、朝鮮的反日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帝國日本的統治體系面臨根本上的改變。

日本民主化也迎來了全盛期。此處所說的民主，是指普通選舉制、政黨政治和兩大政黨制。普通選舉制自甲午戰爭後得到提倡，相關法案曾多次在議會上提出但馬上又被否決。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隨着吉野作造（1878—1933）的民本主義一時風靡，議會也迎來了將其法制化的機運。受此影響，1925年，護憲三派內閣正式通過普通選舉法，並於1928年在衆議院議員選舉中首次實現了男子普通選舉。此外，“一戰”中的1918年，以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1856—1921）為首的首次政黨內閣正式成立，並在1920年中期將政黨政治作為“憲政的常道”固定下來。

但是，日本對“戰後民主”的反動卻出人意料地提前到來。這一方面是由於軍部對華盛頓體系下的裁軍不滿，另一方面是因為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和經濟的區域化。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預示着軍部開始獨立自行其事。1932年“滿洲國”宣佈建國，1933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等，則明顯違背了“一戰”後確立的華盛頓體系，是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②由此，一直作為“一戰”後體制基調的非軍事化方向開始被完全逆轉。更為重要的是，1930年中期以後，多數國民開始對彷徨不定的政黨政治感到不安，對貧富差距感到不滿，開始偏向對外強硬，並對“暴支膺懲”的呼聲產生共鳴。最後選擇脫離“戰後”的，恰恰是日本國民自己。雖然也有石橋湛山（1884—1973）等自由主義者對“滿蒙領有論”提出批評，但在大多數人都支持一舉解決“滿蒙特殊權益”的背景下，前者的聲音則顯得過於弱小。

隨着1937年中日開戰和接下來的國家總動員體制，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均開始通過戰時動員推行社會兵營化。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則推進皇民化運動，甚至強行要求與本土一樣地參拜神社和獎勵改名等精神層次的一體化（同化）。“滿洲國”甚至先於日本施行了經濟統制，構建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國防國家思想。

^{①②}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56—59、59頁。

四、“二戰”的“戰後”與去殖民地化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戰敗；此後六年多的美軍佔領，迅速推動了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戰後”日本經過佔領期的多項改革，第一次實現了自明治以來軍事化和民主化的完全分離（“一戰”後的裁軍祇是局部的非軍事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放棄了殖民地和佔領地的非軍事化。可以說，民主化、非軍事化與去殖民地化的同時進行，纔是“戰後”日本的出發點。與中國、朝鮮不同，“戰後”一詞之所以作為規定自己的認識架構並發揮強力的統合功能，其原因便在於此。

當然，戰時體制和戰後體制之間也並非沒有任何聯繫。雖然“國體”變成了象徵天皇制，但同時又重新規定天皇是“日本國民的統一象徵”，因此，戰前和戰中的權威基本秋毫無損地得到繼承。日本國民也未嚴格追究昭和天皇（1901—1989）的戰爭責任（雖說部分是美國佔領政策的考量結果）。另外，作為戰時體制中的一些計劃管制體系，如傾斜生產方式在戰後的經濟復興政策中也得以延續。“1940年體制”論則認為，戰時的勞資關係、金融政策和官僚體系都得以延續下來。但是，戰時體制並非整體上全部過渡到戰後體制。必須指出的是，戰前和戰後在總體上是不連續的，消除戰時體制的努力，在戰後改革的一系列過程中都可以明顯觀察到。

轉而看東亞國際關係，其最大問題在於“冷戰”這一新的戰時體制的出現，導致日本原有的“去殖民地化”問題完全被非軍事化問題沖淡了。^①因此，經過戰敗和美軍佔領期，1952年恢復“獨立”後，除部分知識分子外，去殖民地化問題對日本國民而言已擱置起來，漸漸稀釋了。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新時代，戰後民主觀念在社會深深扎根，使得帝國時代民主化所內含的殖民地主義責任被忘卻。這既可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沒有敗給中國”、“甲級戰犯的責任是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等歷史認識，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②

隨着“冷戰”結束，被封殺的去殖民地化課題又作為徘徊在東亞的幽靈復活了。由此帶來的是，“冷戰”結束這一新的“戰後”。如果說1931年是近代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那麼，1980年是不是現代日本“脫離戰後體制”的開端呢？新的“脫離戰後體制”要走向何方？為了不再讓悲劇和鬧劇反復重演，人們需要做些什麼？

“二戰”中的日本人高唱“東洋和平”，卻陷入了戰爭泥沼；2015年的今天，高唱“國際貢獻”的日本卻在內閣主導下朝着“積極的和平主義”方向修改憲法解釋。對彷彿再次置身於新的“戰前”之中的日本人來說，重新探究已經歷過的“戰前”和“戰後”關係，在“戰後”七十年之際，其意義變得愈發重大。

[作者簡介]村田雄二郎（むらたゆうじろう，MURATA Yujiro），1982年取得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學位，1982—198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留學，1999—2000年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擔任客座研究員，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從事晚清與明治時期的日中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清末中日關係史新探》（合著）、《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合著）、《晚清中國與日本：宮廷・變法・革命》（合著）等。

^①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76—77頁。

^② 劉傑：“終戰と日本の責任認識問題——蔣介石政府と汪兆銘政府をめぐって”，《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第3—29頁。

予以批評，這與韓國歷史學者對國家教科書國家編訂制度的反對一樣，無疑是維護“廣泛民族主義”以及“東亞共同歷史記憶”的勇敢行為。歷史學者們抵制國家權力對歷史研究及歷史教育不當干涉的良心之舉，必將成為抵制“狹隘民族主義”復蘇的重要手段。

當然，這裏並非是否定東亞三國現行的歷史教育或歷史教科書編訂中國家所起的作用，而是強調各國應根據自身國家具體的政治情況選擇恰當的國家編訂制度、審核認定制度或者自由選擇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國家編訂制度還是國家審核制度，都需要歷史學者們對國家權力的作用積極自由地發表意見。這與健全的政治民主只有在民衆積極參與的前提下纔能實現是一個道理。更進一步說，增進東亞三國歷史學界之間的聯繫，乃至於與世界歷史學界的聯繫是非常有必要的。圍繞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國議會的演講，包括美國歷史學者在內的國際歷史學界對其進行了強烈的批評；以此為契機，抵制“狹隘民族主義”的回歸將是世界歷史學者的共同目標。

[作者簡介]裴京漢（Bae Kyoung-han），1995年在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獲博士學位（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01—2002年任韓國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現為新羅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史學科教授、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兼任浙江大學近代中國與蔣介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長期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國民革命的分析研究》（合著）、《蔣介石研究》、《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孫中山與韓國》、《汪精衛研究：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曲折》等。

“歷史記憶”與“歷史共有” ——中日“國民感情”的正確解讀

李長莉



中日關係在東亞區域發展進程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兩國之間的親疏既體現在政府層面的互訪，也體現在民衆之間的日常交流。如何看待近年來中日之間的“國民感情”，日本政府新近發佈了兩個數據：一是日本內閣府於2014年12月20日公佈的“外交輿論調查”，在受訪的近兩千名日本人中，對中國“無親近感”的比例達83.1%，創這項調查四十年來的新高。日本外務省表示，這一調查結果“反映了調查期間的‘國民感情’”。^①二是日本文部科學省2015年2月彙總的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赴中國大陸留學的日本學生人數較上一年增加18%，達到2.11萬人。這是文部科學省自1983年開展調查以來，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學生留學首選地。^②另據中國國家旅遊局公佈的統計資料，2014年，中、日、韓三國旅遊交流規模從十年前的年1300萬人次躍升到2000萬人次，增長超過50%。其中，中日兩國人員互訪達512萬人次，赴日中國遊客為241萬人次，來華日本遊客為271萬人次。^③這前後兩組數據顯示的都是中日“國民感情”，但前者是極度“惡化”，後者卻是相當“熱化”；兩者都呈上升態勢，但方向卻正相反。人們不禁產生疑問：究竟是相信日本政府設計的“問卷投票”及其解讀呢？還是相信日本民衆自主自發來到中國的“行動投票”呢？顯然，後者要比前者可靠、可信，至少它可以讓人們對日本外務省的“官方結論”提出質疑。

^① 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査報告書”，<http://survey.gov-online.go.jp>

^② 齊旭：“五年內往來人員增千萬 中韓VS日本：政冷經熱”，《新民晚報》2015-04-14。

^③ 中國旅遊局信息中心：“推動中日韓三國旅遊更便捷、更舒適、更安全”（2015-04-13），中國旅遊局官網。

的近現代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建設和平與友好的東亞新格局》，在日本題為《未來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3國の近現代史》）。這一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有來自三個國家總計五十四位編者，歷時三年，在大量會議和相互討論的基礎上編寫而成。值得高興的是，統一的歷史教科書為解決三國歷史爭端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當然，圍繞統一教科書的內容也出現了一些批評的聲音，特別是指責教科書對於現存的很多爭端未能找到解決方法，而祇是對其進行羅列。但不可否認，統一的歷史教科書的出版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收穫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2012年，韓國又正式出版了由韓、中、日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東亞歷史教科書《한중일이 함께 한동아시아 근현대사（韓中日一起編寫的東亞近現代史）》（中國出版的題為《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日本出版的題為《新しい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該教科書在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創建共同歷史記憶、勾勒光明未來等方面受到廣泛關注並獲得好評。《韓中日一起編寫的東亞近現代史》與《開創未來的歷史》相比，通過切實協調意見突破了原來的局限性，從國際關係和國際交流的角度很好地把握了東亞近現代史的整體脈絡。雖然目前僅用做補充教材，在普及推廣上受到局限，但是通過將其靈活運用於高中教學之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學生對東亞三國的歷史整體理解的覺悟。特別是與日本、中國一樣，韓國也開始認識到本國歷史研究以及歷史教育中充斥着“狹隘民族主義”，因而，摒棄“狹隘民族主義”、走向“廣泛的民族主義”的社會覺悟不斷增強。這種覺悟意識的提高以及韓國高中2013年正式開設“東亞歷史”的選修科目，都是這些變化的直接證據。未來高中東亞史科目如何克服“狹隘民族主義”，能夠取得怎樣的成果，成為韓國歷史學界關注的熱點。

三、國家權力與歷史研究、歷史教育

雖然東亞三國統一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實踐帶來了非常積極的影響，但現實中的韓國歷史教育卻面臨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就是從2009年開始到現在，執政者樹立了所謂“國籍化歷史教育”的歷史教育目標——儘管具體的教育方向略有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狹隘民族主義”的復蘇態勢。這種回歸保守的現象整體上看有很強的親美乃至親日傾向，具體來說就是主張對歷史教科書特別是國史（即韓國史）科目進行國家編訂。在經歷了1980年以後政治民主化的急速發展，由國家編訂教科書制度改為審核認定制度後，又重新恢復為國家編訂制度，這引起了整個歷史學界強烈的反對。在韓國於2014年5月召開的全國歷史研討會上，“歷史編纂與國家權力”也因此成為了研討會的共同主題；當時參加歷史學研討會的大部分歷史學相關學會均積極參與，還聯合署名反對政府的歷史教科書國家編訂制度。

從嚴格意義上來看，現在日本、韓國實行的教科書審核認定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容忍了對歷史研究或者對歷史編訂的國家干涉。很多批評者認為，根據國家權力性質的不同可以很容易地對歷史教科書內容進行修改，這存在着極大的危險性。因為，時下日本教科書否認侵略歷史的問題，與日本政府擁有的審核認定許可權不無關係，其危險性顯而易見。由此可以推斷，現在韓國政府推進的國史教科書國家編訂制度的回歸與日本相比潛藏着更大的危險性。國家編訂教科書制度增大了國家權力左右歷史闡述的內容或者方向的可能性。這樣的話，“狹隘民族主義”借國家政策之名復活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極右的歷史觀念遭到了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已充分表明了國家權力干預歷史編訂的危險性。安倍首相在不分輕重的“民粹主義”（Populism）裹挾下，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基礎，不僅常常發表否認“從軍慰安婦”等日本戰爭罪行、歪曲侵略事實的言論，更是明目張膽地提出了恢復“狹隘民族主義”的主張，其試圖對作為戰後日本政治改革後盾的“和平憲法”進行修改，重新開闢戰爭（海外派兵）之路的野心昭然天下。對此，最近包括日本歷史學研究協會在內的很多學術團體和歷史學者等都對安倍政權否認和歪曲戰爭罪行的行徑

國的日本也造成不計其數的人員傷亡，東亞所有國家都飽受世界性戰爭災難的折磨，不堪回首。

儘管東亞三國民族主義間的衝突造就了充滿否定意義的歷史記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時期，東亞三國間也在相互合作與連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在共同面臨西方列強侵略東亞的危機時期，相互連帶的三國曾提倡亞洲主義——1870年代末開始，在日本興起的早期亞洲主義源于日本領導亞洲的主張，雖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卻是擁有共同文明的亞洲人共同抵抗西方（白種人）對亞洲（黃種人）侵略、守護亞洲、實現共同繁榮的主張，包括古典亞洲主義或者浪漫亞洲主義的主張；中國與韓國志士對於這種連帶主張給予了聲援與配合。

除了東亞三國之間的合作與連帶外，共同面對日本侵略時中國與韓國志士間的合作與連帶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段歷史。1910年，日本對朝鮮半島強制合併之後，次年便爆發了中國的辛亥革命；在此影響下，朝鮮半島的仁人志士開始大規模流亡中國，並對中國的共和革命給予支持。1919年，以在中國流亡的韓人志士為中心，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韓國臨時政府，中國革命家們對此也予以積極支援。1920年代，大批韓人志士參與了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而中國方面也對韓國獨立運動給予支援。“七七事變”爆發後，韓人志士們開始投入到中國的抗日戰爭中，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超越了以自身為中心的狹隘民族主義，以互惠與合作為目標，開闢了“廣泛民族主義”新天地。這些珍貴的歷史經驗，對於後人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整體上來看，東亞近現代史既充斥着許多集矛盾、爭端、戰爭為一體的否定意義的歷史記憶，也包含着肯定意義的歷史記憶，祇不過後者並未很好地呈現出來。當強調個人自由的個人主義像尊重自己的自由那樣尊重他人的自由、發展為成熟的個人主義時，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同理，當民族主義超越自我為中心或者排他性民族主義的階段，尊重其他民族的存在與自由時，纔能成為成熟的民族主義。重塑並強調成熟民族主義的歷史記憶，應該成為東亞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的關注。歷史學者們在揭示和強調東亞三國民族主義之間對立、矛盾以及由此引發戰爭的可能性和戰爭爆發的悲劇性後果等具有否定意義的民族主義的同時，更應該努力揭示和強調東亞三國民族主義之間的協力和連帶，即“廣泛的民族主義”。

二、東亞共同歷史記憶的創建以及共同歷史教科書的編撰

由外交摩擦引起的歷史爭端時有發生，該歷史爭端是集團性歷史記憶的產物；在集團性歷史記憶的創建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歷史教育了。這裏所指的歷史教育，不僅指的是學校開設的正規的歷史教育課程，還包括輿論媒體、網絡等信息在內的多種形式的非正式歷史教育。但無論是正規的歷史教育課程還是非正式的歷史教育，國家權力對其都具有不可否認的影響力。

韓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爭端從1965年韓日外交恢復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但近來這一爭端不斷升級乃至成為國際性問題，直接導火索就是2001年日本出版了《新版歷史教科書》，並且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審核通過。該教科書由右翼媒體產經新聞旗下的扶桑社出版，由此也可以推斷該教科書是以自民黨中部分右翼勢力為首的極右政治集團、右翼輿論以及右翼歷史學者們主張的集中體現。根據《新版歷史教科書》，1910年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強制合併是“為了促進亞洲安全”，並且是“通過合法途徑實現的”；對於中日戰爭期間最令人感到羞恥的抹殺人權的代表事例“從軍慰安婦”的存在予以否認，並歪曲其性質。《新版歷史教科書》是從將東亞三國推入悲慘戰爭深淵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而編寫的，未來日本“狹隘民族主義”再度興起的可能性令人堪憂。

其後，中國、韓國與日本圍繞這一問題的正式討論也隨之開始。2002年，在中國南京召開的“歷史認識與東亞論壇”上，日本學者提出嘗試在中國、韓國兩國學者同意下由中日韓三國的歷史研究者、歷史教師以及部分市民團體共同參與編寫統一的歷史教科書。在2005—2006年兩年間，中、韓、日三國共同出版了《미래를 여는 역사(開創未來的歷史)》（在中國題為《東亞三國

創建東亞共同歷史記憶之路徑

裴京漢



中國、日本、韓國這三個東亞國家對於歷史闡述以及歷史解析的對立與爭議由來已久，但是近年來的歷史紛爭已經超越了以往的地域性範圍，轉而成爲國際性的爭議，甚至到了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惡化的境地，這對於三個國家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從歷史研究者、歷史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觀察東亞三國間的歷史爭端，它已遠遠超越了建立在具體研究之上所闡述的“歷史”本身，成爲某種被人爲不斷強調的“集團性歷史記憶”；特別是近代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出於政治意圖的考慮，過分強調國家或民族整體性，製造各種集團性的記憶或者刻意強調某段歷史。因此，近來持續升級的東亞歷史矛盾，與其說是學術領域的爭議，

不如說是國家權力或者國家權力巨大影響力背後的普通大眾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義的理念，又對這種國家權力給予凸顯與深化。爲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密切聯繫的東亞三國實現和平共榮的目標，構建所需的歷史記憶，摸索創建理想歷史記憶的途徑，各國均需要從東亞歷史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克服“狹隘民族主義”，正視和解決在排他性、否定意義的歷史記憶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歷史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近現代東亞歷史與“狹隘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

如果要尋找一個貫穿東亞三國近現代歷史的共同主旨的話，那麼，民族主義則是首選。儘管學術界對此還存在一些爭議，但東亞三國都曾在經歷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之後開港(開國)，並以此作爲近代的起始點。之後，號召民族獨立及自強的抵抗性民族主義作爲開港後的統一目標，一直貫穿於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不可否認，在開港後的近代化發展歷程中，日本走在了中、韓兩國的前面；但遺憾的是，日本在經歷了19世紀中期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後徑直踏入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開始對外擴張。由此也可以说，日本的對外擴張是一種否定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即對外擴張的民族主義。它是具有另外一種指向性的民族主義。

在西方列強侵略的危機中誕生的東亞三國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附加爲自身民族生存進行反抗和鬥爭的強烈排他性特徵。正因爲如此，儘管東亞三國的民族主義都源於對西方列強的反抗，但這種共同基礎並不牢固，一開始就隱藏着相互對立的結構性缺陷。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後，開始對外擴張，並強行侵佔琉球，使得 1870年前後的東亞三國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局面正式顯露。

此後，深陷“膨脹的民族主義”的日本轉而向朝鮮半島進攻，與對朝鮮擁有宗主權的中國清王朝呈現正面對立之勢；1894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正是以中國爲中心的傳統東亞國際秩序（中華體制）與日本帝國主義海外侵略猛烈撞擊的結果。之後，進一步擴張的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海外侵略包括對朝鮮半島的強制合併（1910年），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以及傀儡政權“滿洲國”的建立（1931—1932年），對中國關內地區的戰爭挑釁（1937年）以及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東南亞地區、太平洋地區的戰爭擴大（1941年），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東亞所有地區都深陷戰爭泥潭。戰爭不僅給侵略受害國的韓國、中國帶來悲慘的結果，對於戰爭發起

一、“親近感”並不等同於“國民感情”

日本內閣府已延續四十年的這項“外交輿論調查”問卷設計的問題是：“對中國有無親近感？”關於“親近感”，日本《學研國語大詞典》釋義為“親しみを持ち、近づきたいと思う気持ち”（感覺親密、想接近的心情），中國《現代漢語詞典》對“親近”一詞的釋義為“親密而接近”。兩義基本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問卷題目中“有無親近感”的對象是“中國”，而非與日本“國民”對等的中國“國民”。這就意味着，受訪的每一位日本普通國民要回答的是：在中日兩個國家關係現狀下，作為日本國民對於對方“國家”是否抱有“感覺親密而想接近的心情”。回答者的立場和標準自然明確：立場就是作為日本國民的一員對對方國家取何種態度，標準就是本國與對方國現在關係的好壞。因為，對於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採取什麼外交政策，畢竟是由政府操作，普通國民不可能有深入、全面的瞭解，也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沒有直接關係，他們只能以所屬共同體——自己的國家為立場。特別對於“團體性”很強的日本人來說，作為“國民一員”，以本國政府的外交態度作為對對象國採取“團體一致”態度的立場和標準，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訪民回答問卷對於中國“有無親近感”，實則表達的是對當時本國與中國關係好壞的感受和心情。當然，不排除回答問卷時有人出於對兩國關係現狀的不滿與擔憂而選擇內心希望兩國“親近”的意向，作出與“團體主流”不同的表達，但多數訪民會順從“團體主流”立場及標準來作答。因此可以說，這一對中國“有無親近感”民調資料的升降變化，祇是反映了日本國民對調查時兩國關係好壞之下對中國“抽象形象（往往是由本國政府和媒體所勾畫）”的感受和心情。

回顧一下歷年來日本內閣府這項調查結果的變化，恰恰也是與兩國國家間關係的好壞直接相關。1983—1984年，因兩國領導人互訪及中國政府邀請三千名日本青年訪華，兩國關係熱絡，這一民調結果是，有親近感者分別為72.5%和74.5%，佔絕對多數，無親近感者祇有19.8%和19.2%。此後幾年，有親近感者一直佔據多數。至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政治風波”、日本加入西方制裁陣營而使親近感下降，但有親近感者仍超過半數。此後，直至2003年，有無親近感者都基本持平。2004年，因中國公民登釣魚島被日方扣留及中國駐大阪總領館被日本右翼宣傳車衝撞事件等使兩國關係出現裂痕，無親近感者升至58.2%，明顯超過有親近感者的37.6%。此後，無親近感者一直佔多，且有所增加。直至2010年，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漁民、漁船事件而使兩國關係裂痕加大，當年的調查結果是，無親近感者明顯上升至77.8%，有親近感者降至20%。2012年，因釣魚島爭端及歷史認識問題等使兩國關係緊張，無親近感者升至80%，有親近感者降至18%；2013年與此相近，直到2014年無親近感者升至83.1%，引起兩國媒體輿論驚呼為“史上最惡”。^①

造成兩國關係變化的原因，既有因一時一事的摩擦帶來的短期影響，也有這一期間中日兩國經濟實力升降變化的長期效應。1980年代，日本經濟實力遠高於中國之上；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力快速提升；至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日本經濟則陷入長期低迷。這對於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百餘年間一直以亞洲頭號強國和先進國自居而俯視甚至蔑視中國（甚至由此發展為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人來說，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實際壓力。兩國關係遂由1980年代的強弱上下縱向“攜手”關係，轉變為兩強並立、相互競爭的橫向“對手”關係。反映到日本內閣府的這項歷年調查中，就表現為日本國民對於中國的態度，由“攜手”關係時的“感覺親密而想接近”的“親近感”，向“對手”關係時“不感覺親密而想接近”的“不親近感”轉變。正因如此，在國際輿論熱議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的2010年，日本內閣府的這項調查結果顯示，日本訪民對中國“無親近感”者由前一年的58.5%，陡然上升至77.8%，這應當是這種被超越的壓迫感和對抗感、加上兩國外交摩擦相互交織，在日

^① 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査報告書”，<http://survey.gov-online.go.jp>

本國民心理上引起的自然反應。

因此，日本內閣府的這項“外交輿論調查”，比較準確地說，反映的是作為日本國民對於中日關係現狀下的對手國——中國，抱有怎樣的感受和態度；“不親近感”的上升，反映的是日本國民對中日競爭對手關係緊張度上升而形成“對抗感”強化的感受。也就是說，正如其名為“外交輿論調查”那樣，這祇是一項日本國民對於兩國外交關係現狀感受如何的民意調查。

但是，對於這項調查結果，日本外務省作出的官方解讀卻是“反映了調查期間的（日本）國民感情”。這一“權威”解讀，又被日本內外媒體輿論廣為接受並沿用，甚至又進一步地推演。於是，“國民感情”一詞成為伴隨這項調查結果輿論議論的“熱詞”，並推演成了如下一些結論：“日本國民感情普遍厭華”，“對華厭惡感達史上最高”，“中日國民感情極度惡化”，“兩國九成國民彼此厭惡”等等，由此引發兩國輿論一片憂慮和悲歎，甚至引起兩國一些網民情緒化的隔空罵戰。

然而，與前述對日本內閣府這項輿論調查的本來意涵進行對照，就會對其結果反映日本“國民感情”的說法以及由此推演出的結論產生疑問：這種解讀是否準確？調查問卷中的問題“有無親近感”是否等同於“國民感情”？這裏所指的日本“國民感情”針對的對象為誰？是對“中國”，還是對“中國國民”？需要加以具體分析。

“感情”一詞，中日文共用。《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對人或事物關切、喜愛的心情。”《學研國語大詞典》有二義，一義為：心中的憤怒、喜悅、悲傷、快樂、寂寞等感受；^①另一義為：對事物或人抱有的心情心態。^②第二義與中國詞典釋義相近。據一般用詞規則，兩個對等相關項應彼此對應，即國家對國家、國民對國民。“國民感情”的主體是“國民”，而且具有一定的整體性，其對應的對象也應當是對等的他國“國民”，即他國的“國民感情”。因此，“國民感情”一詞似乎可以定義為：指一個國家國民對其他國家國民所抱有的是否關切和喜愛的感情。事實上，作為一個在談論中日關係時約定俗成的組合詞，“國民感情”的含義決非僅僅如字面上咬文嚼字的生硬解釋這樣簡單，而是具有中日兩國之間深厚而久遠的歷史文化連帶感及其積澱的內涵，並且為雙方所共同理解。正因如此，這個詞成為中日討論雙方關係時喜歡常用的“熱詞”，而在討論歷史文化關係不如中日深厚的中美、中歐關係時很少使用。這就提示人們，在談論中日之間的“國民感情”時，不能忽視其歷史文化內涵。

如果本着中日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來看待彼此的“國民感情”，對照前述日本官方對“外交輿論調查反映日本國民感情”的解讀，就會發現，日本外務省的“權威解讀”並不準確。

首先，從字面而言，調查問題是對中國“有無親近感”而非與日本“國民”主體對等的“中國人”或“中國國民”，因而日本訪民的回答祇是表達在中日國家間關係現狀下對“中國”的感受和態度，而並非對“中國國民的感情”，更不能代表中日兩國民眾之間的“國民感情”。

其次，就內涵而言，日本訪民在中日國家間關係現狀下對“中國”的感受和態度，並不能等同於日本國民基於兩國深厚歷史文化積澱而形成的對中國國民的“國民感情”。中日國家間關係一時的好壞變化，可能會引起兩國民眾對彼此國家、政府或領導人產生一時的喜厭好惡、有無親近感的變化，但作為兩個一衣帶水、有着兩千年交往和深厚歷史積澱及文化淵源的鄰國之間的“國民感情”，決不是由一時一事、暫時國家關係的變化而完全決定的。

由此可見，日本官方對此項“外交輿論調查”反映日本“國民感情”的解讀是一種誤讀和曲解。這一誤讀通過媒體輿論形成進一步推演誇大的結論，進而對兩國民眾對於彼此“國民感情”的認知形成誤導，得出與事實不盡相符的認識，使得兩國“國民感情”受到一定損害。

日本官方的這項調查及其解讀，祇是形成這樣一種效應：將日本訪民對中日國家間關係陷入低谷現狀下對中國“無親近感”大幅上升達史上最高，解讀為日本人對中國“國民感情”空前極

① 日文原文為：心の中におこる、嬉しい・悲しい・楽しい・さびしいというような感じ。

② 日文與“感情”詞義相近的“氣持”一詞釋義為：ある物事・人などに對して起る心の狀態。

度惡化，由此證明日本“國民感情”與日本政府現行對華強硬政策高度一致，進而表明日本現行對華政策代表了日本八成以上的普遍“民意”。如此一來，日本政府現在採取對華“強硬對抗”政策，就有了日本人普遍“極度厭華”的“國民感情”這一“民意”基礎和正當性。就這樣，日本民衆的“國民感情”被與日本政府的現行對華政策捆綁在一起，成為其現行對華政策民意化、合理化的注腳。

二、“國民感情”與“歷史記憶”

中日民衆對於彼此的“國民感情”主要由兩種因素所決定：一是國家間關係的現實利害，二是兩國及國民關係的歷史積澱。前者是眼前利益，後者是深遠積累；後者是基礎，前者祇是在後者基礎之上的疊加，並將會隨着時間推移而成爲後者的一部分。由於中日兩國特殊的地緣關係及歷史文化淵源關係，特別是近代以來十分密切、恩怨交織的關係，使得“歷史積澱”在兩國“國民感情”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分量。正因如此，中日兩國的“國民感情”纔如此豐富而複雜、深厚而長久，並不是一朝一夕、一時一事所能決定和改變的。也正因如此，導致近年兩國關係摩擦而陷入低谷的兩大癥結：一是海島爭端，二是“歷史認識”問題，都與歷史有關。對於前者，兩國國民站在各自國家的立場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這既需要兩國政府通過對話對之進行理性應對與把控，也需要兩國政治家和學者對這一爭議問題進行認真研究和真誠交流，以求趨近共識，化解爭端。對於後者，則牽涉的是“歷史認識”問題，它更深切地牽動着兩國的“國民感情”。

人們的“歷史認識”基於“歷史記憶”。作爲國民的“歷史記憶”，即民衆對以往歷史的體驗、見聞、記述、交流、傳承並通過一定載體而留存下來，被民衆廣爲接受並傳遞給後代的歷史形象及其解釋。中日兩國民衆雖然共同經歷了近代以來兩國緊密聯繫的歷史，但是由於分處兩個國家，特別是兩國還經歷了戰爭，戰後又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因而作爲兩國國民，對於以往歷史的體驗、見聞、記述、交流、傳承等內容有所不同，由一定的載體而留存下來的歷史形象及其解釋也有所不同。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也正是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差異，往往造成兩國“國民感情”的隔閡，甚至傷害。

如對於以往日本侵華戰爭的記憶與認識，作爲受害國中國民衆來說，無數的親人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殺戮、殘害、欺壓、侵奪，或家破人亡，或背井離鄉，生者也長期生活在貧窮困苦、屈辱絕望、悲哀恐懼之中。這種遭受侵略的巨大傷害，不僅深深印在親身體驗這一苦難的一代人心裏，印在到處殘留着戰爭遺跡的廣闊土地上，也形成了“歷史記憶”而留存在後代人心間，令幾代人刻骨銘記。正是遭受侵略和戰爭的災難，教會了中國人要奮力自強，增強自衛能力，珍惜和平，警惕和反對侵略戰爭。對於曾經侵略中國、造成戰爭災難的日本，中國民衆則希望日本國民能反省侵略戰爭的罪行，瞭解中國民衆受害的歷史事實，充分理解與尊重中國民衆反對侵略戰爭的感情，使兩國人民達成反對侵略戰爭、維護永久和平、保持友好相處的共識。

然而，日本國民對於那段歷史的“歷史記憶”，則與中國民衆存在很大差異。由於日本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加害者”一方，當時的日本國民從對華戰爭中體驗的大多是勝利、征服、掠奪、收穫等愉悦的“獲得感”。戰敗後的日本雖然被國際社會判定爲侵略戰爭的“加害國”，一些主要“戰犯”也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但由於戰爭的發動者、領導者的戰爭責任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算，一些人還很快恢復了在日本政府內任職，使得日本政壇一直有不願承擔戰爭責任及掩飾、美化侵略戰爭的右傾勢力存在，他們與社會上的右翼勢力相互呼應，採取掩蓋侵略罪行、歪曲歷史事實、美化戰爭參與者、淡化戰爭記憶等手段，使得一些日本國民的“歷史記憶”狹隘缺失，偏離歷史真實，也偏離和平正義的普世價值。這種狀況特別到近年，親身經歷戰爭的一代逐漸離世，對於僅靠前代傳承而形成“歷史記憶”的當代日本人來說，這種偏離更加嚴重。

據日本《每日新聞》2014年12月報導，日本媒體與大學聯合調查結果顯示，現在日本人口中

有八成是戰後出生，他們當中一半人沒有聽說過戰爭，其中20歲—30歲年輕人中約有六成從未聽說過戰爭。另據日本《讀賣新聞》2015年2月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對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祇有5%的受訪者表示“很清楚”，44%的受訪者表示“知道一些”，49%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完全不知道”；60%的受訪者表示，是通過學校教育和教科書瞭解戰爭的。^①由此可見，在日本政府右傾勢力主導下對侵略戰爭掩飾、淡化的策略，對於塑造沒有戰爭體驗的當代日本人、特別是青少年一代“去戰爭化”和“去罪責化”的“歷史記憶”確有成效。日本國民特別是年輕一代“歷史記憶”的日漸偏失，與中國、韓國等戰爭受害國國民“歷史記憶”的差異愈漸拉大，勢必成為兩國“國民感情”及兩國關係的障礙，也給未來的東亞和平埋下了隱患。

但是也要看到，自戰後至今，日本國民中一直有許多愛好和平、具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士，包括政界、學界、社會、媒體、律師、商界人士及普通民眾，自發地發表文章、著述，組織民間和平組織，舉辦集會、展覽等，開展各種反省戰爭、謀求和平的活動。他們頂着右翼勢力的壓力甚至威脅，揭露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犯下的毒氣戰、活體解剖、強征“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被日本政府及右翼極力掩蓋而不被日本民眾廣泛瞭解的罪行，敦促日本政府認真反省戰爭，承擔戰爭責任，反對日本政客掩飾、美化戰爭罪責的右傾化言行。^②日本民間和平人士堅持不懈的和平努力一直持續，形成來自民間、以民間和平人士為主導的反對美化戰爭、反省侵略罪行、謀求東亞和平的民間“歷史記憶”，以求矯正掩飾戰爭責任的右傾化“歷史記憶”的偏失，縮小與中、韓等受害鄰國“歷史記憶”的差異，以求得與中、韓等受害鄰國和平友好相處，共建亞洲和平國際關係。這股民間和平力量雖然在當今日本社會不佔主流，但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且他們堅持不懈，使得這股民間面向和平的“歷史記憶”具有持久頑強的生命力，代表著日本國民中理性、和平的力量，他們因而也得到受害國中國民眾的尊敬，成為連接中日民間友好的紐帶。日本這些愛好和平人士，正在做着增進中日“國民感情”的事。

三、“歷史記憶”與“歷史共有”

雖然中日兩國民眾“歷史記憶”的差異導致兩國國民的“歷史認識”存在差異，但隨着時代的變化，這種狀況也在發生改變。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中日兩個東亞鄰國的經濟聯繫愈加緊密，國家共同體與“東亞利益共同體”的重合度日益擴大。在此環境變化之下，中日兩國國民更需謀求消解“歷史認識”上的隔閡，尋求建設“共同歷史認識”，以鑄造兩國永久和平、友好相處的“國民感情”基礎。

“共同歷史認識”的基礎是“歷史共有”，即對“歷史事實”的共同確認和瞭解，以及“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對此，中日兩國學者及各界人士多年來做了許多工作。在他們的推動下，已經取得不少進展。例如，2006年，安倍晉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時訪華，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組織中日兩國權威歷史學者進行“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經過雙方多位學者長達三年的認真研究、反復研討、交換看法，於2009年底完成了第一階段研究成果報告並公佈於世。報告指出，雖然兩國學者對一些戰爭具體事實的認定上存在差異，但“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性質及戰爭暴行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③這是第一次由中日兩國學者依據兩國政府協議而進行的共同歷史研究，是兩國政、學兩界共同認可的權威性研究。它奠定了兩國“共同歷史認識”的基礎，也應當成為兩國政治家和國民大眾的歷史認識基礎。2014年10月，由參與“共同歷史研究”的中日學者撰寫的報告《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的中文、日文版在兩國同時交付出版，中日兩國民眾

^① 趙松：“日媒調查：近五成日本受訪者不知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人民網，2015-02-25。

^② 步平：《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③ 步平：《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步平、[日]北岡伸一 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二〇一五年 第三期

通過閱讀報告內容，會自主作出理性判斷，會對兩國學者共同研究達成的“權威歷史共識”抱有尊重和接受態度。這也是建構兩國國民“共同歷史認識”的基石。

“共同歷史認識”的前提是“歷史共有”，它既需要親身經歷者的如實陳述，文獻和遺跡的物化留存，以及後世學者的研究認定，並誠實地形之於書籍、影視及大眾讀物，還需要通過傳播、教育等傳承形式，形成國民世代傳承的“歷史記憶”。通過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相互交流、瞭解和共有，向着“共同歷史認識”趨近。

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與共有，是民衆通過自主行爲即可進行的有效方式。在中日民間交流交往日益擴大的今天，兩國愛好和平的學者、文化界、旅遊界人士，以及衆多去對方國家旅遊、觀光、工作、學習的人們，都可以以自己的行動做到。例如，每年超過500萬人次的兩國互訪遊客，在對方國家除了欣賞美景、參觀古跡、品嘗美食、選購特產之外，也應當去參觀遍佈各地的歷史博物館，特別是記錄近代中日歷史、兩國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博物館、紀念館、歷史遺址遺跡等，去看一看對方國民的“歷史記憶”怎樣，與本國的“歷史記憶”有何不同，並認真地回味思考一下“戰爭與和平”對於兩國人民的意義。兩國的學者、媒體人和文化界、旅遊界等人士，應當鼓勵和引導兩國遊客做這樣的“歷史游”、“文化遊”。這就是“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與共有。

對於去日本的中國遊客而言，也應當到日本的歷史博物館、紀念館瞭解作為戰爭“加害者”和“受害者”雙重身份的日本國民形成了怎樣的“歷史記憶”，思考如何縮小兩國國民“歷史記憶”的差異，增多歷史事實的共有內容。此外，日本各地還有不少記錄近代中日友好交往歷史的紀念館和遺跡。如孫中山領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是改變中國近代命運的重大事件，但對於孫中山及這場革命與日本的關係，一般的中國民衆瞭解不多。其實，日本是孫中山領導革命的首要基地——自1895年領導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即避往日本，後於1905年在日本東京聯合黃興等一批留日學生、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開始進行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後，又於1913—1916年間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開展反袁獨裁鬥爭；直至逝世前數月的1924年冬，由廣州北上途經日本時，又停留10天。在孫中山長達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總計進出日本14次，在日本居留時間累計達9年，約佔他流亡時間的一半，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據日本學者考證，孫中山結識、接觸、交往過的日本人，包括政、軍、財、文等各界人士約三百人，與孫中山及革命志士黃興、宋教仁、何天炯、戴季陶等有過交往及各種關係的日本各方面人士達千人以上。^①因此，日本各地留存着不少孫中山及革命志士與日本人士交往的歷史遺物遺跡。日本友好人士對此倍加珍視，有些被精心保存下來。他們通過建立紀念館、設立歷史遺跡以及舉辦展覽、演講、集會等各種紀念活動，讓這些中日友好交往的歷史作為國民的“歷史記憶”而固化。

這些與中國友好交往的歷史遺存及所承載的“歷史記憶”，是連結中日友好的紐帶，通過赴日旅遊參觀的中國人的瞭解，可以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記憶”。這些中日友好交往的“歷史記憶”，就是中日深厚的“國民感情”的基礎。祇要兩國國民以“自主”態度加強相互瞭解，從“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做起，不斷向“共同歷史認識”趨近，就能由“歷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國民感情基礎。

[作者簡介]李長莉，1989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赴東京大學、大東文化大學、創價大學、里昂第二大學、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波士頓大學、斯坦福大學作訪問研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先覺者的悲劇——洋務知識分子研究》、《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等。

① [日]安井三吉：“解說”，《孫文・日本關係人名錄》（神戶：孫中山紀念會，2012）。